

揽尽天下秘趣



探尽世间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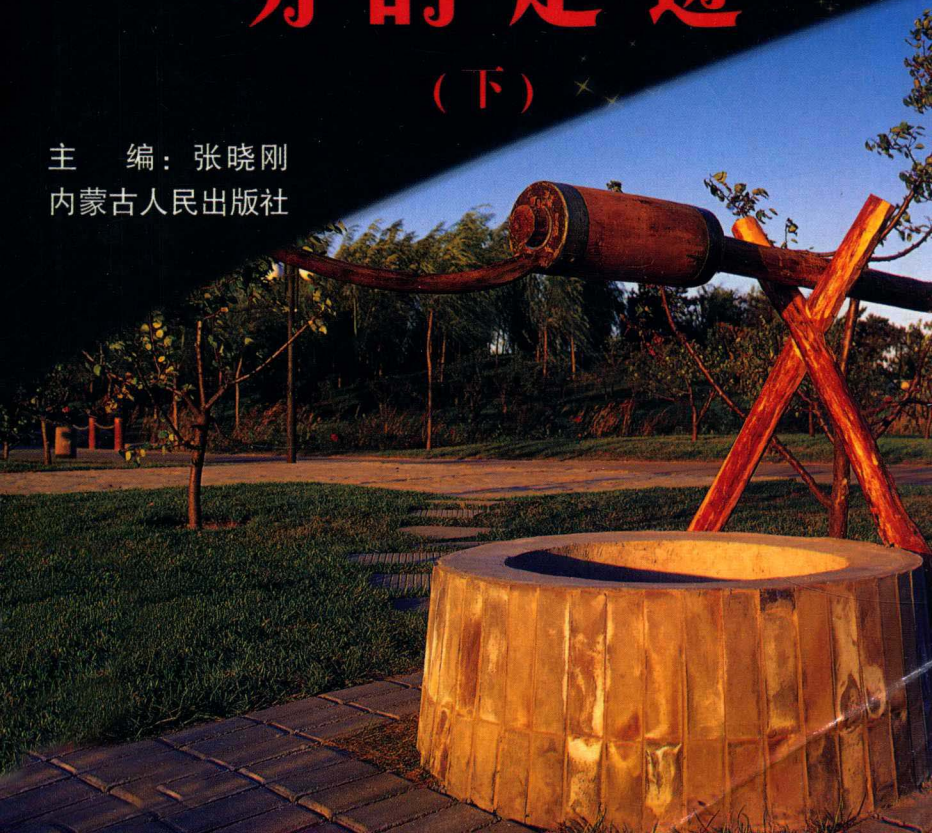


魅力科学

追寻远逝文明 的足迹

(下)

主 编：张晓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魅力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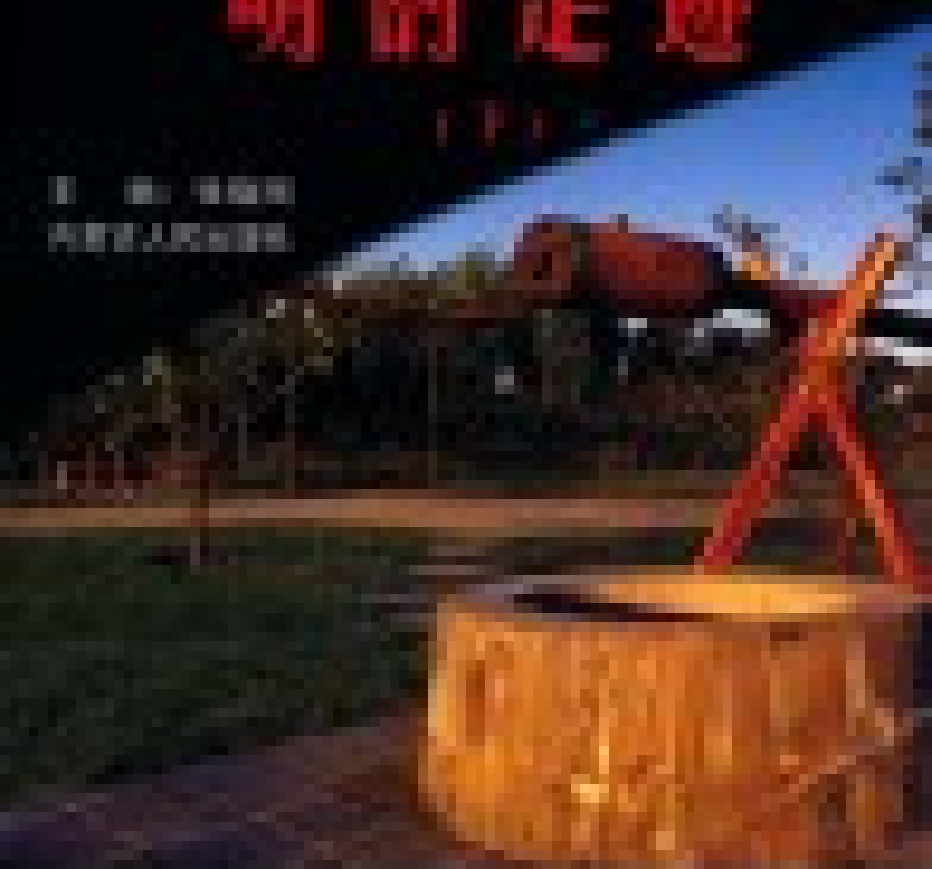
追寻远古文明的足迹

● 魅力科学

追寻远古文明 的足迹

王宇信

图 文 读 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K103/107:2, 001189265

魅力科学

追寻远逝文明的足迹

(下)

主编 张晓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远逝文明的足迹. 下/张晓刚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5

(魅力科学)

ISBN 978-7-204-09575-9

I. 追… II. 张… III. 文化史—世界—普及读物
IV. K1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7487 号



书 名:魅力科学
主 编:张晓刚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道 20 号
印 刷: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 1092 1/32 开
印 张:280
版 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套
书 号:ISBN 978-7-204-09575-9/Z·544
定 价:1120.00 元(四十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土耳其地下城来历

土耳其横跨亚欧两大洲,是东西方交通的要道,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就通过这里。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尤其是卡巴杜西亚的格尔里默谷地,因地处火山活动地带,大量的火山灰堆积形成质地较软的凝灰岩。凝灰岩与一般的岩石不同,其硬度不高,稍微用力可挖成洞穴。

土耳其有其特殊的地理景观,其中之一就是洞穴特别多。有人说,那里是穴居者的天堂。传说在公元3~4世纪的时候,基督徒为了逃避阿拉伯人的胁迫,逃到这里营造了自己的避难所,从而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地下文化。

1963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东南300公里的卡巴杜西亚高原上的德林库尤村爆出一条大新闻:一个农民在院子里掘地时,偶然碰到一个洞口。村民们架着梯子顺着井口似的入口,通过8层过道,找到一个无所不包的地下城镇。通往地下城市的通道隐藏在村子各处的房屋下面。这些古城从地下层层叠叠、深达数十米,且纵横交错。据有关人员勘测,这些地下古城的年代远比基督教建筑要早得多,在历史上也没有任何记载。在地下古城中,整个地带布满了地道和房间,居室、礼堂、酿酒坊、牲畜圈、仓库等设施可谓应有尽有。在地下城中心还有通气孔与地面相连。而城市与城市之间则有隧道相通,就现在已勘测到的最长隧道达9000米长。

从现在的挖掘来看,地下城的规模相当大,有3.5万条小型通道,它的通风设施也很完备,纵横交错的隧道两旁排列着无数住宅,还有礼堂、作坊、水井、食物贮藏室以及专做

墓地的洞室。52 个通风管道通向地面隐蔽处,几条供逃跑用的地道造得非常巧妙。据勘测,从地面通风口算起,最深的地下通风井竟达 86 米深。在地下城内,人工开凿的石梯抬头可见,每层之间都以石梯相连。地下城的古代居民相互注意传递信息,墙上凿有通话孔。据估算,这个地下城可容纳 20 万人。

隔了两年,又一个同等规模的地下城在凯梅克里附近被挖掘出来。令人惊讶的是,这两座地下城是个双连体,有一条 10 千米长的地道把两城连接起来。

到目前为止,已发现地下城市不下 36 处。当然,有的只能算是地下村,因为它们小得只能容几户人家到几十户人家安身。地下城大多是超过 13 层的立体建筑。最大的就是那两座相通的具备城市规模的地下城。

地城洞穴内部布置得相当讲究,以凯马科尔都市为例,它是一座 7 层的地下城,据证实当时住有 15000 人之多,有垂直通气孔,还有地下井、储藏室和酒窖,每间屋子都装着门,里面甚至还备有贮水的水缸。

如此庞大恢宏的地下城,是谁建造的呢?

有人认为,肯定不是土著,而是从远地避难而来的人建造的。他们之所以选择卡巴杜西亚,是因为它荒凉,绝无人迹,不会引起外人注意。村民们最初是用石头砌房子,后来觉得用石头还不如直接凿房于岩内,并由地面逐渐延伸到地下,于是发展成了地下城。

那么,最早的居民是谁呢?这些地下城究竟是怎样凿成的?最早的居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这些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土耳其从公元前起就是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熔炉,在历史上曾先后被赫梯、高卢、希腊、马其顿、罗马、帕提亚和蒙古人入侵并统治,但这些地下城市的出现时间似乎比这更早。考

古学家已经在最底下的一层中发现了闪米特时代的器物。闪米特是一个古老的神权民族,大约在公元前 1000 年曾在这里生活过,其都城哈图什离代林库尤大约有 300 千米。人们据此判断,这些地下城早在赫梯人以前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有人甚至认为它的建造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因为人们早已在卡巴杜西亚西南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用来制造石斧、石刀的黑曜石石场,而卡巴杜西亚不远处就有距今 9000 年前后人类古城遗址。

据记载,自公元 4 世纪以来,当时的基督徒曾在此地挖掘栖身的洞穴、修道院和教堂。今天的卡巴杜西亚山岩下布满了古代的修士们留下的大量宗教遗迹。

这么宏大的工程绝非一年半载就可完工,仅仅凿通城市与城市之间一条长 9000 米长的隧道,就要 1000 人连续工作 10 年以上。至于整个工程,不仅需要极大的劳动量和大量的工具,而且还需要精密的组织工作。如果说,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仅凭原始的石刀、石斧、草绳等简陋工具要完成勘测、规划、设计、挖掘、运输、后勤等工作,那么其难度可想而知,更何况他们的工作好多是在地下和石头打交道,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而在更早以前,在卡巴杜西亚已经发现过成千座岩洞教堂和地下教堂。它们凿在小岩石山内或悬崖上,有的相当富丽堂皇。岩石被巧妙地琢成拱门、圆柱、拱顶,每一英寸壁面和柱体都装饰着线纹和图案,这些壁画栩栩如生,甚至修道士们的斋堂、厨房、卧室里面的祭坛、餐桌、坐椅、床铺、家具也都是石头制品。

这些地下石头城是怎样凿成的?

在纯粹手工劳动的情况下,从坚硬的熔岩中掏出这么大的空间,单从地下清运出那么多的石渣,就要克服多少困难啊!也许是建设者的坚韧精神战胜了大自然,经过了几代人

的努力才挖成的,或者是远古时代卡巴杜西亚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形成了隧道式的熔洞,在其基础上经过人工拓展而成的都市。

这么庞大的城市为什么要建造在地下?如果说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既然城市的建造者们能够建造出容纳 20 万人居住的庞大城市,那么把它们建在地面同样可以起防御的作用,而工作量难度要远远小于建在地下。如果说是为了隐蔽,那么他们在躲避什么呢?还有,如前所述,这里土地贫瘠、水源匮乏,生存条件之恶劣犹如月球的表面。那么,这座可供 20 万人居住的城市,需要多少粮食、水源及必需品,他们是靠什么去获取,又靠什么来维持生存呢?

有人认为,人们之所以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由于对敌人的恐惧。谁会是敌人呢?

首先,假设地面上的敌人拥有军队,他们肯定能看到用过的土地和空空如也的房屋。而地下城里建有厨房,炊烟将通过通气井冒出地面,也极易被发觉。人们不会不知道,把待在鼠洞般的地下城市里的人们饿死或者封死通气口憋死他们,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据此有人认为,人们恐惧的不仅仅是地面上的敌人,他们在地下岩石中开凿避难之所,是因为他们害怕能飞行的敌人。

有些研究者注意到,在远古时代卡巴杜西亚一带可能发生过某种原因不明的大爆炸。这里古建筑的废墟与乱石都显示出剧烈爆炸后的痕迹。在地下城所发掘的古代文献中,也曾提到过“飞行的敌人”。这样看来,地下城也许是用来防备“飞行的敌人”用的。但是,这些“飞行的敌人”又是谁呢?

闪米特人在他们的圣书《科布拉·纳克斯特》中就描述过,所罗门大帝怎样利用一辆飞行器把这一地区搞得鸡犬不宁。不仅他本人,他的儿子,所有恭顺他的人,也都曾乘坐过

飞行器。阿拉伯历史学家阿里·玛斯乌迪曾描述到所罗门的飞行并大致介绍了他的部族。当时的人类对于飞行现象产生恐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许他们曾被剥削、奴役过,所以每当报警信号响起来的时候,人们就逃进地下城市。

人面狮身像的建造之谜

法国著名的古埃及学者玛斯佩罗,在他 1900 年出版的《遥远的帝国》中,特别研究了图特摩斯四世立的人面狮身像石碑,并写道:“人面狮身像石碑的第 13 行空栏中,冒出来一个卡夫拉王的徽纹记号……显示了卡夫拉曾经主持过一次清除人面狮身像沙土的复原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人面狮身像至少在胡夫王,或他以前的王朝所建,然后被埋在沙土中……”

另外一位著名的古埃及学者玛利艾特也同意这个说法。玛利艾特为最早发现“库存表石碑”(如前面所述,碑文中清楚地记载道,人面狮身像早在胡夫王以前,便存在于基沙高地)的探险家,他认为人面狮身像早已存在于基沙高地,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是从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末的不到 100 年间,古埃及学家对人面狮身像的看法,有了极大的转变。现代的正统派古埃及学者中,没有一个再愿意认真地考虑、讨论人面狮身像的年代,而它在卡夫拉统治埃及的数千年前便已存在的说法,在 19 世纪末,还被视为常识,但是到了今天,却成了大胆妄言。例如,埃及考古厅负责基沙及沙卡拉地区的扎希·哈瓦斯博士便认为,许多过去的理论都已“随风而逝”,因为“我们掌握了非常坚实的证据,可以证明人面狮身像其实是属于卡夫拉时代的产物”。

同样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考古学家卡洛·雷蒙表示,人面狮身像的年代比卡夫拉久远的这种说法“简直令人无法置信”。她认为:“人面狮身像没有任何可能比卡夫拉久远,因为基沙地域在卡夫拉王统治前的几千年,不但没有那种工艺水准,

更没有必备的管理组织,和建造起那种规模的建筑物时所需要的意志力。”

但是在仔细研究后可发现,现代学者其实只有三个间接的理由,支持人面狮身像是由卡夫拉王所建的说法:

理由一:因为图特摩斯四世所建的人面狮身像的石碑,第13行的空栏中,冒出卡夫拉王的徽纹记号。

玛斯佩罗对卡夫拉王的徽纹记号,提出了一个完美的解释:图特摩斯四世将人面狮身像复原后,便立了一个石碑,以对曾做过同样行动的先人表示敬意,而他表示敬意的对象,就是第四王朝的卡夫拉王。这个解释强烈暗示人面狮身像在卡夫拉时代即已非常古老。然而,现代的古埃及学者并不接受这说法。现代的古埃及学者似乎头脑都一样地食古不化,众口一词地认定,图特摩斯四世在石碑上放上的那个徽纹记号,是为了要纪念原始人面狮身像的建造者(而非复原者)。

由于石碑上残留下来的只有那个唯一的徽纹记号,其他前后文均已消失,学者竟然能够如此铁口直断,一口认定人面狮身像非为第四王朝时代的作品不可,这种结论难道不会太不成熟吗?只因为一个第四王朝法老的徽纹(石碑本身还是第十八王朝的法老王所建的),便认定整个雕刻为当时的作品,这算是哪一门子的“科学”?而且时至今日,连那个徽纹都已开始剥落模糊……

理由二:因为邻近的河岸神殿,也是卡夫拉王所建的。

这种说法的证据相当薄弱(因为河岸神殿为卡夫拉王所建的说法,建立在神殿中有卡夫拉王的雕像之上。然而,雕像很可能是后来的人将它放进去,而非原始便在那儿的)。但是,古埃及学者却对这种说法拥护有加。他们不但认定河岸神殿是卡夫拉王所建,顺便也把人面狮身像的建造,算在卡夫拉的头上(因为两者之间显然有一些关联)。

理由三:因为很多人认为,人面狮身像的面相,与河岸神殿

的洞穴中发现的卡夫拉王雕像非常相似。

这显然是个人见解的问题。而纽约警察局专门制作蒙太奇相片的专家,最近用电脑进行比较后,也认为两者并无相似之处。也许最终“学术判决”还没有出来,“陪审团”至今还在思考,谁才是这个巨大雕刻的建造者。会是卡夫拉王吗?还是史前一些拥有高度文明,却尚不为人知的建筑家们?不论学者们决定他们比较喜欢哪一种说法,两者都仍有可能。在缺乏完整的、坚实的、毫无质疑余地的证据下,没有人知道真实是属于哪一边。

虽然,埃及的吉萨大金字塔,是埃及人建造的,但它的建造者,却不是埃及人。王后卡夫拉王的陵墓,是埃及人建造的,但它的建造者,却不是埃及人。王后卡夫拉王的陵墓,是埃及人建造的,但它的建造者,却不是埃及人。王后卡夫拉王的陵墓,是埃及人建造的,但它的建造者,却不是埃及人。

王后卡夫拉王的陵墓,是埃及人建造的,但它的建造者,却不是埃及人。王后卡夫拉王的陵墓,是埃及人建造的,但它的建造者,却不是埃及人。王后卡夫拉王的陵墓,是埃及人建造的,但它的建造者,却不是埃及人。王后卡夫拉王的陵墓,是埃及人建造的,但它的建造者,却不是埃及人。

王后卡夫拉王的陵墓,是埃及人建造的,但它的建造者,却不是埃及人。王后卡夫拉王的陵墓,是埃及人建造的,但它的建造者,却不是埃及人。王后卡夫拉王的陵墓,是埃及人建造的,但它的建造者,却不是埃及人。王后卡夫拉王的陵墓,是埃及人建造的,但它的建造者,却不是埃及人。

浸水之谜

远古的石像是否曾被特大的洪水淹没过,这是揭示石像产生的重要依据。

这场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美国一位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约翰·安东尼·韦斯特,正在着手研究杰出的法国数学家、象征主义者施瓦勒·德拉布里奇晦涩难懂的作品。施瓦勒以其对鲁尔苏尔庙的论著而著称。他在 1961 年发表的《神圣科学》一文中评论说,考古学发现暗示我们:“12000 年以前很少有困扰着埃及的气候和洪水。”他写道:

在洗劫埃及大地的一次次特大洪水来临之前,一定有一段规模庞大的历史文明期。这一推测使我们确信,人面狮身像在那段文明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这尊矗立在基沙西部高崖上的雕像,除头部之外,整个狮身都现出无可争辩的水浸迹象。

施瓦勒简单明了的结论以前并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一结论明显抨击了埃及学领域广泛认为人面狮身像是由卡夫拉在公元前 2500 年建造的这一观点。韦斯特在读到施瓦勒的这段话之后便认识到施瓦勒从地质学角度提供了一条探索的途径。从这条途径出发就可以“真正地证实,早在古埃及王朝文明以及其他所有已知的人类文明的数千年以前,可能已经存在过另一个文明期,或许其规模比后来的都大”。韦斯特说:

“要是能证实人面狮身像受过水浸这一点,便会推翻所有世人已接受的人类文明编年史,也会迫使我们去支撑整个现代教育的“历史过程”的种种假设重新定论,并迫使我们去面对由此而引起的激烈争论。然而,从石刻古迹上很难发现问题,就算是很简单的问题……”

韦斯特对从考古学角度得出的结论的理解是正确的。如果人面狮身像表面的一切变化部位能证明是水浸的结果,而不是像埃及学家们一直认为的是风沙吹蚀的结果,那么,已经建立起来的编年史就要面临被推翻的危险。要理解这种推断,只要牢记下面这两点就够了:首先要记住,远古埃及的气候并非像今天这样始终都异常干燥;另外一点就是,比起莱纳和其他一些人认定的人面狮身像“背景建筑群”的理论,韦斯特和施瓦勒提出的人面狮身像侵蚀模式更加完善优秀。韦斯特和施瓦勒提出的人面狮身像的这个变化特征,是基沙遗址的某些古迹所不具备的。这种变化特征的提示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部分建筑是在同一时期建成的。

但这是哪一个时期呢?

韦斯特最初认为:

“理论上不排除人面狮身像受过浸蚀的可能。因为大家早就一致认为,过去埃及曾多次受到海水和尼罗河特大洪水的困扰。就在不那么遥远的古代还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洪灾,人们认为这是最近一次冰季冰川融化而造成的。一般人认为,最后一次冰季的时间是在公元前 10500 年前后,而尼罗河周期性的大洪水就发生在这之后。在公元前 10000 年前后发生的那次大洪水是最后一次。因此可以推断,如果人面狮身像受过水浸,那它一定是在洪水发生之前建成的……”

从“理论上”看,韦斯特的这种推断确是站得住脚。可是,正如韦斯特后来所承认的,实际上人面狮身像所受到的不同一般的腐蚀作用并非是“洪水”引起的。他后来认为:

“问题是人面狮身像的脖颈以下已经腐蚀得很厉害。如果这种腐蚀是由水引起的,那就是说,在整个尼罗河流域至少有 60 英尺深的洪水。很难想象发生这样大的洪水会是什么样的景象。这种假设如果成立则更糟,因为人面狮身像堤道的另一端,即所谓的丧葬庙里面的石灰质岩心石,也已经受到浸蚀。这

就是说,洪水已爬到金字塔的底座,也就是,有 160 英尺高的洪水……”

埃及政府采纳了西方一些埃及学家的建议,自 1993 年开始禁止在人面狮身像周围一带进行任何地质学或地震学研究工作。这项决定实在不可思议,因为斯科克的研究结果已产生了重大影响。

更不可思议的是,斯科克独创论点尚未遇到有凭有据的公开挑战。这位波士顿地质学家几年来顶住了来自同行的一次又一次的抨击,多次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论点。斯科克坚持认为,人面狮身像表面以及壕坑内壁独特的侵蚀模式(人面狮身像壕坑内壁布满了很深的竖直裂缝和高高低低的平的坑凹),成了“石灰质古迹在历经数千年雨水之后会受到何等侵蚀程度的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典型例证……”。斯科克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已经了解的基沙一带的古代气候背景去分析雨水浸蚀的观点,那就可以充分证明“伟大的人面狮身像的历史要比传统认为的公元前 2500 年早得多……我只是跟着科学在走,科学告诉我这一结论:人面狮身像的历史比以前认为的要早得多”。

斯科克自然尚未证明人面狮身像属于公元前 7000 年—公元前 5000 年,韦斯特尚未证明他认为的更早的历史时期,传统埃及学也尚未证明人面狮身像到底是否属于卡夫拉王朝和公元前 2500 年的那个时代。

换句话说,目前尚无可能用任何合乎情理的标准来给这一独特古迹的确切归属和历史下最后的定论。人面狮身像之谜仍未解开。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谜

约公元前 4000 年在希腊语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方,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已经产生了文明。大约公元前 3000 年,两河之南的苏美尔人已经建立了数以十计的城邦,这是迄今知道的人类最早的文明。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曾被人遗忘,直至 19 世纪的考古发掘才为世人所重知。19 世纪德国哥丁根大学希腊文教授格劳特芬德,花费许多年读懂了波斯石刻上的 40 个楔形文字中的 8 个字,并运用这 8 个字读出了石刻上 3 个国王的姓名。1835 年英国人亨利·罗林生以同样的方法,释读了那 8 个字,此后,又释读了贝希斯敦石崖上的碑文。1848 年至 1879 年,欧洲人在原亚述首都尼尼微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发掘,挖掘出了 2 万多片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和各种文物 5 万多件。这些重大发现为进一步了解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奠定了基础。

根据考古资料推断,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字体系源于苏美尔。约公元前 4000 年后期,苏美尔人创造了图画式文字。但是,这种文字有它的局限性,只能表达某种具体事物,无法表示抽象的概念。公元前 3000 年,这种文字发展成为楔形文字。因为苏美尔人通常用平头的芦竿在未干的软泥版上印刻出字迹,所以它的笔道非常自然地都呈楔形。最初,苏美尔人把楔形文字刻成直行,自左上方下行。后来为书写得更清晰和避免已写出的文字受损,书写的方式改为每行由左至右,各行自上而下。

楔形文字是由一个音节符号和音素符号组成的集合体,

总计约 350 个。它的结构相当复杂,在阿卡德时代应用的领域日渐拓宽。巴比伦和亚述帝国兴起后,楔形文字不仅是实体事物的记录,也发展成为供宗教、历史、文学、法律等方面使用的文字。它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很大,埃兰人、赫梯人、胡里特人、米坦尼人先后采用楔形文字表达自己的语言。

两河流域很早就有了文学作品,在苏美尔时期,文学作品以诗作为多。作品的主题大多是礼赞神祇、英雄和君王,具有宗教和神话的性质。例如,苏美尔人有一则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后来被犹太人吸收编造了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再现在《圣经·旧约全书》的《创世纪》中,后经基督教的宣传,诺亚方舟的故事广为流传。

在巴比伦时代,大部分文学作品采用阿卡德语,但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主题与情节和风格仍是苏美尔时代的,无非已经过加工雕琢,增加了新的风采。

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反映阶级矛盾、寓意深刻的佳作,如《主人与奴隶的对话》描写了主人和奴隶就 12 个问题进行的简短对话,揭示了在奴隶制度下奴隶无法生存的哲理。

自然科学在古代两河流域已有发展,早在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天文学就已产生了。苏美尔人在观察月亮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编制了太阴历。他们把两次新月出现的期间作为一个月,每月包括 29 天或 30 天。又根据月的圆缺和季节变化,分一年为 12 个月,6 个月为 29 天,6 个月为 30 天,每年 354 天。它比太阳年(365 日 5 时 48 分 46 秒)短 11 天多的时间,为此设置闰月加以调整。古巴比伦时期,人们已能将肉眼看到的星体绘成星图,能够把恒星和五大行星区别开来,还观测出太阳在恒星背景上的运动轨道——黄道。以后,巴比伦人又区分出黄道上的 12 个星座,绘出黄道 12 宫的图形。新巴比伦时代,人们能够预测日蚀、月蚀和行星的会冲现象。同时,人们又以 7 天为一周,分别以日、月、火、